

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的 重要历史文献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刍议

齐鹏飞

[摘要] 2009 年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这批陈独秀早期文稿真迹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填补了陈独秀文本研究的空白，进一步扩充了诸如《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与胡适关系等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文化救亡转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救亡的思想轨迹。

[关键词] 陈独秀；手稿真迹；《新青年》；文物价值；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2009 年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 13 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最早出现在拍卖会上，系中国嘉德 2009 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 2833 号拍品。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陈独秀的书信手稿真迹。其第一次在中国内地拍卖会上出现，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同年，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首次实施“文物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并于同年 7 月整体性地交付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

2009 年 7 月，“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入藏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致辞中指出，国家文物局把这批涉

及建党历史的重要文物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保管，是国家文物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的有益尝试，将有利于促进文物保护馆藏事业在高校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文本研究水平。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发祥地，学校在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学术领域有着雄厚的科研实力。这次“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重要文物入藏人大博物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校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领域的文本研究水平，还将极大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馆藏实力。他表示，人大博物馆将严格按照国家关于珍贵文物的保管规定，安全妥善保存、科学保护保管，并尽快进行展示、编辑出版图录，组织专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1]

二

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共 13 封 27 页^①，时间跨度在 1920—1932 年之间，主要为陈独秀致胡适信，内容涉及《新青年》独立办刊问题、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问题、陈独秀第五次入狱前出版文稿问题等，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和中共建党史的重要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对于这批重要历史文献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已经有专家作过初步评价。曾经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鉴定评估之专家、鲁迅博物馆前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指出：“这些书信涉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兄弟和钱玄同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反映出《新青年》杂志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对杂志发展的思路，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对‘五四’时期的历史背景研究有助于后人看清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就陈独秀个人而言，由于其去世较早，所留下的文稿较少，其中与鲁迅的学生台静农探讨语言学的信件保留在台湾台静农家中，与胡适来往的信件大部分留在台湾和美国，而早期手稿尤为罕见……此次收购的信件对于陈本人的性格、文采、信念都展现得十分充分，其个人形象跃然纸上。”^[2]著名的胡适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指出：“信札的内容直接反映了《新青年》杂志两位主要领导人物的思想发生分歧的过程。当时陈独秀正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立场上与胡适分道扬镳。这些史料对于厘清《新青年》的分裂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历史背景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信件中陈独秀的手迹确为真迹，字体飘逸俊秀，作为文物也有其价值。国家将其买下用作研究，是办了一件好事。”^[3]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指出：“我从各方面鉴定后，认为其是真品，而且在国内没有发表过……这些信札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十分珍贵的。因为这些信主要是 1920—1925 年陈独秀

从新文化运动转向建立共产党、从文化救亡转向政治救亡过程中，与胡适为首的坚持文化运动的北京同人之间的矛盾斗争情况，填补了这段历史的许多空白，特别使人看到在新文化运动中结成‘黄金搭档’的陈独秀与胡适分离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感人情感。”^[4]

当然，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其文物价值大于史料价值。主要依据在于：这批书信的绝大部分并不是刚刚被挖掘出来，而是此前已经被公布并为学界所初步利用。2009 年第 4 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一文，其中披露：“《新青年》同人的来往书信是我们研究《新青年》从一个同人刊物转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这一历史过程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迄今有关这一过程的文献材料已先后公布三批。2002 年 4 月 6 日我前往华盛顿参加美国一年一度的亚洲学年会时，顺途访问了居住在华盛顿的胡适长子胡祖望先生一家。访谈之余，胡先生出示了一包他保留的未刊书信，外面有一张旧报纸包裹，报上有胡适用红毛笔题写的‘李守常、徐志摩、陈独秀、梁任公遗札’字样。内中除了梁启超、徐志摩致胡适信外，其他信大多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弥足珍贵。这些信何时由胡适交其长子保管，并带往美国，我们暂不得而知。现在我们将这批书信整理出来，公布于世，以飨学界同人。通过新发现的这批书信与前此已公布的的书信相互印证，我们对《新青年》同人在转折时期的思想分歧以及胡、陈之间的交谊可有更为充分的了解。在整理这批书信时，曾蒙耿云志、沈寂、杨天石、陈漱渝诸位先生帮助辨认，在此一并致谢。”^[5]该文整理并公布了 15 封书信，其中李大钊致胡适 1 封、周作人致李大钊 2 封，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中所未见的。同年，欧阳哲生教授还在 2009 年第 3 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利用这批新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而写就的研究成果——《〈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 1920—

^① 具体信件内容可参见黄兴涛和张丁整理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

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欧阳哲生教授整理并公布的这15封书信中，有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商榷的不尽准确的辨识字词，以及作者误识等其他相关问题^①。

欧阳哲生教授整理并公布的15封书信，前7封与中国人民大学此次公布的编号相同，因多出3封，另加上1封信的作者判断有异以及时间估计略有出入，编号也自然出现差异。中国人民大学整理公布的第8封、9封、10封、11封、12封，分别对应于欧阳哲生公布的第10封、8封、11封、14封和15封。当时，欧阳哲生教授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整理并公布的1封——陈独秀致胡适（1932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整理文档的编号为13，后来由胡适后人手中流出（据未经直接证实的消息说，这批书信是嘉德公司于2009年2月在美国从胡适的儿媳曾淑昭处征集而来），一共13通27页，以“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为标题集中出现在2009年中国的拍卖会上。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绝大部分内容并非首次公布的缘故，所以，笔者认为，其文物价值大于史料价值。

三

尽管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存在着前文所指出的一些缺憾，但是笔者仍然认为，这批重要历史文献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不可低估。

首先，就其文物价值来看，陈独秀的一生，经历复杂而曲折，跌宕起伏，颠沛流离，身前身后毁誉不定，遗留下来的书信手稿并不多，且散落各地。而这批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由胡氏后人手中流出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经过专家反复鉴定和论证，确为真迹无疑，且数量集中、保存完好、字迹明晰、品相很高，文本研究的价值突出。

其次，就史料价值来看，由于其内容涉及前文所列举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的重要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重要历史文献。虽然其中绝大部分书信手稿的内容已经通过多个渠道公布，并且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已经加以初步利用，但实事求是地讲，重视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对于其史料价值的挖掘和利用还远远谈不上充分。这里，笔者拟重点谈几个学界普遍感兴趣的“热点”问题。

（一）关于陈独秀往来书信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问题

近年来，随着学界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相关研究领域之基础研究资料的不断挖掘和日益丰富，关于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问题，大有经过拨乱反正回归历史本原的积极趋向，因而也就迎来了新一轮的“陈独秀研究热”。而要将陈独秀研究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学术水平，就必须有丰富而扎实的基础研究资料尤其是第一手的基础研究资料——陈独秀的所遗文本为支撑。陈独秀书信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者张静如曾经感叹：“陈独秀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对陈独秀的遗文研究还不够。”^[6]目前，国内学界已经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陈独秀书信，仅仅是其一生浩繁的所写书信之一小部分，远远没有穷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对于陈独秀书信进行编辑、出版的主要有：《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不算重复收录者，已经收集、整理并公布的陈独秀书信约500封左右。

另外，港澳台地区对于陈独秀书信进行编

^① 具体之处，请见本期同时发表的黄兴涛、张丁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整理注释》及黄兴涛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

辑、出版的主要有：《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香港自由中国社 1949 年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96 年编辑出版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整理并公布了 1939 年至 1942 年间的陈独秀百余封书信。台湾出版的这批书信是陈独秀写给其晚年好友、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台静农的，台静农 1946 年赴台湾大学任教时带去台湾，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这批书信时间跨度是 1939 年至 1942 年，计 1939 年 6 封、1940 年 35 封、1941 年 36 封、1942 年 17 封，年月不确定者 5 封，只有信封者 12 封。1990 年台静农去世以后，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在编辑出版《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时，单独将其中数量较大的陈独秀书信，以《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之名编辑出版。《书屋》杂志在其 2000 年第 11 期上刊登的靳树鹏选注《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即是其中的一部分。^①

除上述成批、成编的陈独秀书信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散落在陈独秀同时代人的各类著作选编和书信选集中，主要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 1983 年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 1994 年版）、《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等。

还有相当一部分散落在各地各级各类的资料室、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个人手中，有的始终没有正式整理并公布。例如，最早在四川渠县档案馆发现、后来经过四川省档案馆上交北京中央档案馆收藏保管的陈独秀晚年致杨鹏升的书信 40 封，都是陈独秀晚年写给对他进行多方面资助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杨鹏升的，时间跨度是 1939 年至 1942 年，多由“江津鹤山亭”寄出，收件地址为成都西门外北巷子九里堤劲草园，信纸或用宣纸，或用一般写字纸，每页左下角均有“独秀用笺”的印章，其字体以小篆为主，间或草书。陈独秀最后一封信写于 1942 年 4 月 5 日。陈独秀对杨鹏升多年的资助表

示“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信封的背后，留有杨鹏升的字迹：“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悼悼何极。”^②又如收藏保管在沈寂手中的陈独秀致程演生信等^[7]。有的已经经过正式整理并初步公布。例如，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 年第 5 期，由鲁迅博物馆供稿、陆品晶注释的部分陈独秀书信；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的部分陈独秀书信；欧阳哲生在 2009 年第 4 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一文，披露了收藏保管在胡适后人手中的关于《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 15 封（其中有陈独秀书信 10 封），亦即后来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主体。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除已经被欧阳哲生先行整理并公布的部分外，尚余 1 封——陈独秀致胡适（1932 年 10 月 10 日），还没有正式公布。相信，此次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整体性地整理并公布“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将会对目前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陈独秀书信之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笔者认为，随着近年来陈独秀书信新手稿的不断发现和日益丰富，出版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陈独秀书信集》或《陈独秀书信选》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将为促进陈独秀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文本和史料支撑点。

（二）关于《新青年》的研究

《新青年》，1915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 年 9 月 1 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改名为《新青年》。1917 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从第四卷第一号（1918 年 1 月）起实行改版，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1920 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 1920 年 9 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 年 1 月《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广州，出版了第九卷第一号至第六号。1922 年 7 月休刊。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后，由

^① 参见靳树鹏：《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载《书屋》，2000（11）。

^② 参见谢颖、路明：《40 封信披露陈独秀晚年心迹》，载《华西都市报》，2005-07-27。

月刊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一共出了四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又由季刊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到1926年7月停刊。历时十年十个月零十天。^[8]

《新青年》从一本综合性的同人文化杂志转变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是新文化运动史、五四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的思想流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切入点。而此时期他们之间大量的往来书信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解读路径。

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学界已经有全面而深入的丰硕成果，这里不再冗述。本文仅仅围绕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集中对1920年《新青年》与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发生矛盾以及独立办刊问题，进行一些补充说明。

群益书社是中国近现代的一家小型出版社。1901年由留学日本的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二人（堂兄陈子美出资）在东京创办，1902年迁移至湖南长沙。1907年设分社于上海福州路惠福里，1912年搬至棋盘街（今河南中路）泗泾路口，并将总社迁移至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和湖南长沙设立分社。1935年停业，1945年复业，1951年再次歇业。^[9]

1915年，从日本回国到上海的陈独秀，经过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的介绍，与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二人相识，决定将新创办的《青年杂志》交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据汪原放讲：“据我大叔（汪孟邹）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10](P31-32)}这样，《青年杂志》（《新青年》）第一卷至第六卷的出版发行包括印刷就都由群益书社承担。在此期间，双方的合作是基本

融洽的，“《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11](P31-32)}也就是说，群益书社对《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创刊和初期的发展，的确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从第七卷开始，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青年》与群益书社在合作问题上逐渐出现分歧。按欧阳哲生的话讲：“随着《新青年》声誉飙升，群益书社的利润自然也增大，但书社老板似未改其初时心态，陈独秀与之矛盾遂不断加剧，以致对簿公堂，最终在《新青年》七卷出版后与之脱离关系。”^[12]据相关史料披露，双方产生矛盾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的出版发行问题。对此，汪原放回忆说：“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说，本期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汪孟邹）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13](P31-32)}由于双方矛盾激化，陈独秀遂酝酿收回发行权而自行处理、独立办刊。

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移到上海陈独秀寓所——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当年4月26日，陈独秀给李大钊、胡适等北京同人去信，讲：“《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共同讨论赐复：（1）是否接续出版？（2）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3）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14](P89)}这是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后，就《新青年》第七卷结束以后之事第一次向北京同人征求和咨询意见。此信中所提合同就是指《〈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仍然是如约继续

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包括印刷，没有延期。但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所以陈独秀不能不提到《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是否与群益书社继续签订合同的问题。^[15]

由于北京同人对陈独秀的来信没有及时答复，陈独秀遂在当年5月7日再次给胡适和李大钊去信，催促他们表态。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一——“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1920年5月7日）”。在该信中，陈独秀向北京同人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与群益书社的冲突和自己的态度。

当年5月11日，陈独秀又一次致信胡适，再度进行催促。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二——“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11日）”。

在接到胡适的两封回信以后，5月19日以前和5月19日，陈独秀又发出了致胡适信两封。5月19日以前的第1封回信目前尚不得见，第2封回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三——“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19日）”。

当年5月25日，陈独秀又一次致信胡适，再谈《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以及独立办刊的问题。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四——“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25日）”。

当年7月2日，陈独秀致信高一涵，也谈及《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以及独立办刊的问题。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五——“陈独秀致高一涵（1920年7月2日）”。

上述几封信中提到的关于《新青年》拟独立办刊之招股问题，陈独秀最初的设想是广纳“外股”，而胡适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以《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之撰文作为股份。陈独秀也接受了，并进行了初步尝试，但是效果不佳，主要是北京同人供稿不积极、不充分，令陈独秀颇为失望和不满。而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的招“外股”之努力也进展不顺利。《新青年》的办刊经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陈独秀仍然坚持不与“既想发横财，又怕风

波，实在难与共事”的群益书社妥协，而以自立的新青年社支撑《新青年》独立运作之基本立场。所以，从第八卷开始，《新青年》便结束了此前与群益书社前后共七卷42期的合作关系，走上了独立办刊的道路。而《新青年》的发行工作则交给陈独秀的老关系——汪孟邹主持的亚东图书馆。《新青年》脱离群益书社而独立办刊以后，据说还引起过一桩轰动一时的“官司”。郭沫若就曾经提及：“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的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体。”^{[16](P17)}

目前，学界对于1920年《新青年》走上独立办刊的道路之原因分析，主流意见已经不是传统的“主要是由于陈独秀与胡适关于《新青年》‘谈不谈政治’的思想分歧和冲突所致”，而是认为《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其最直接的诱因。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北京同人已经对由上海编辑部出版的《新青年》日益浓厚的“主义”宣传表示不满，以致与陈独秀之间的思想分歧加剧。事实上，这种思想分歧和矛盾正是日后《新青年》分裂、《新青年》编辑部同人分道扬镳的原始契机和主要根源。对于该问题，学界已经有成熟的研究成果。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也有相关内容涉及于此，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材料。

1920年年底，在关于《新青年》办刊方针方面出现思想分歧后，胡适等北京同人经过商议，由胡适集合诸人意见致信给当时已经离开上海到达广州的陈独秀，正式提出他们对于《新青年》发展出路的不同意见：“《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

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17](P8)}①信中所言钱玄同已经看过此信并赞同有关内容，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八——“钱玄同致胡适（约在1920年12月21日至1921年1月3日之间）”。

1921年1月9日，陈独秀复信胡适等北京同人，表示完全不能接受他们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九——“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张慰慈、李大钊等”。也就是说，陈独秀与胡适这两位《新青年》领袖人物对于《新青年》办刊方针之思想分歧和矛盾，已经是非常严重并且日益公开化了。

1921年1月22日，胡适给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张慰慈、周作人、王星拱、高一涵写信，对以前的意见又有所调整和修正：“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诸位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18](P9-10)}也就是说，胡适态度有所缓和，仅仅坚持《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一说。但是北京同人的反映意见并不一致。如比较消极的钱玄同就已经明显感觉《新青年》之分裂不可避免，所以在1月29日致信胡适：“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情]都不伤，自然不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19](P122-123)}2月1日，钱玄同再次致信胡适，明确表态今后将与《新青年》完全脱离关系，成为北京同人中继刘半农、陶孟和之后，声明退出《新青年》的又一位代表性人物。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十——“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2月1日）”。

至此，《新青年》分裂之势已经不可逆转。

（三）关于陈独秀与胡适的关系问题

在学界，关于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是非恩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被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当然，近年来，已经很少有学者再坚持两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分道扬镳以后即成为水火不容的政敌之传统观点，而是大多认为两人即使在走上迥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以后，在各自坚持自己政治立场的基础上，仍然终身保持着惺惺相惜的个人私谊。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也可以从某个侧面予以佐证。

（1）关于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的问题

在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中，有两封信涉及此一内容，即1925年2月5日的陈独秀致胡适信、1925年2月23日的陈独秀致胡适信。

对于1925年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以及风传的胡适与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合办报纸一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

① 此信未署时间，应作于1920年12月27日后不久。

和激进的青年学生是给予激烈抨击的。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态度则颇与众不同，对于此一问题，更多的是采用“理解式同情”的善意批评和提醒，极力维护这位性情温文而又执著的老朋友的声誉和形象，其情拳拳，其言切切——“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子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分才好。……弟明知吾兄未必肯纳此逆耳之言，然以朋友之谊应该说出才安心。”“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必说及，惟有两层意思还要向你再说一下。（一）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行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还太不够。（二）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说你有‘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为而不知’的危险……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①“道不同”未必“不相与谋”。用学者唐宝林的话讲就是：“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陈与胡关系的特殊性：既坚持原则，又维持友谊。”^[20]后来胡适在参加“善后会议”时消极和不合作的态度以及中途退出，不能完全排除来自陈独秀的点滴影响。

（2）关于陈独秀第五次入狱前出版文稿的问题

在这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中，有一封

涉及此一内容，即1932年10月10日陈独秀致胡适信，也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十三——“陈独秀致胡适（1932年10月10日）”。

学者欧阳哲生在其一篇研究《新青年》的论文中讲：对于陈独秀、胡适等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而言，“编撰《新青年》这一人生经历已是他们难以割舍、永不忘怀的群体记忆”。“《新青年》同人非常重视在五四时期的人生经历和交谊，这种情感常常在他们遭受重大变故时表现得尤为突出。”^[21]笔者深以为然。

陈独秀一生牢狱之灾不断，但每一次，胡适均竭尽所能予以营救。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胡适同样想办法施以援手。在陈独秀待审期间，胡适于当年10月29日在北京大学发表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文学革命的伟大贡献，回应国民党当局对于陈独秀的种种诬陷，“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不是反动？”^[22]而对于陈独秀在被捕入狱的前数日来信所托的两件事，也尽可能地予以帮助。胡适在已经明确得知陈独秀所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因为政治原因而商务印书馆已经不能出版的情况下，仍然与赵元任等好友筹集资金，以解决陈独秀生活方面的一时之需。这一切，无疑令身处囹圄、贫困交加的陈独秀备感温暖。此乃相知有素的一对老朋友半世情缘的真实写照。

笔者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以上释读，是非常初步和粗浅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权当抛砖引玉，敬请专家教正。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梁启超等致胡适信札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网站，2009年7月27日，<http://news1.ruc.edu.cn/102447/65160.html>。

[2] [3] 《陈独秀等致胡适十三封信札相关描述》，陈独秀研究网站，2009年6月24日，<http://www.chenduxiu.net>。

[4] [20] 唐宝林：《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历史记录——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封信》，“五柳村”网站，<http://www.taosl.net>。

① 参见黄兴涛和张丁整理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第十一和十二封信。

- [5] 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 [6] 张静如：《读育之同志文有感》，载《百年潮》，2002（4）。
- [7] [9] [12] [15] [21] 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载《历史研究》，2009（3）。
- [8] 参见网站：“互动百科——《新青年》”，<http://www.hudong.com>。
- [10] [11] [13]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 [14]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
- [16] 郭沫若：《创造十年》，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2。
- [17] [18]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
- [22] 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Document of Hig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lue: Thoughts on “Letters to Hu Shi from Chen Duxiu and Other Scholars”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useum

QI Peng-fei

(Department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y,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Letters to Hu Shi from Chen Duxiu and Other Scholars”, which have been preserved in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useum since 2009, are of hig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lue. The discoveries of these early manuscripts by Chen Duxiu have to some extent and within certain scope filled in the gap in the textual studies on Chen Duxiu. As these letters are important for the studies on the magazine of *the New Youth*, the spreading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 Duxiu and Hu Shi, they will help further enrich the researches o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oreover Chen Duxiu’s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transitioned from democratic cultural salvation to communistic political salvation has been clearly and precisely demonstrated in these manuscripts.

Key words: Chen Duxiu; original manuscript; *the New Youth*; cultural value; historical value

(责任编辑 张 静)